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一五期 ——
(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1e)

【千秋功罪】彭德怀最后岁月言行录	京城孤魂
【资料汇编】文革中的走资派	欧阳龙门
【旧文今赏】相隔不到半年的两首水调歌头词	郭沫若
【历史资料】林彪是现代中国的孔子	《文汇报》
【往事如烟】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十)	老 田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千秋功罪】

彭德怀最后岁月言行录

• 京城孤魂 •

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某人“以大局为重”冠冕堂皇的劝说下，彭大将军不得不放弃真理，遵循那个一贯的“原则”违心的作了检讨。自此“反党集团头子”的大帽子就名正言顺地压到头上，终生直不起腰来。就是六十年代初被任命为“大三线”的副指挥后，在去火车站乘车赴任的路上，“警卫人员”还是像多年来一样严格忠于职守，保持与彭寸步不离，非要与彭同车保护彭的“安全”不可。惹得彭大发脾气。

“文革”中，彭德怀更是给架上了煎锅，翻过来覆过去的被油炸火烧了个死去活来。有了彭的前车之鉴，对于1970年的庐山会议，林彪就是死活不肯开口作检查。无论是老毛的明批暗压，还是某些人的软劝烂缠，林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般地不肯松口。有摆在眼前的彭德怀这么个活生生的惨样，林彪可是不想学。生生逼得毛泽东图穷现匕首，出宫南巡，向各路诸侯亮出底牌。

而此时的彭大将军正在苦熬铁窗岁月。《彭德怀年谱》引用当年监管人员的监视记录，生动

的再现了彭大将军那段艰难而酸辛的最后时光。

难能可贵的是，十多年来，尤其是“文革”以来的残酷批判和斗争，不但没有像常人想象的那样让彭德怀低头认输，反而更加使他更加认为自己的作为是正确的。他愤怒地喊道：

“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我怕什么、你们枪毙了我吧，我什么都不怕。”“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嘛，还吃什么饭，留着你们多吃一点吧。”“好啊，以后有你们的好下场！”（1971年7月30日）

“为什么说我没有好下场？这几十年来了，还说我没有好下场。”（1971年8月5日）

“你们这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列宁主义。人家要发言，你们不让人家发言，就把人家关起来，这就是你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吗？”（1971年8月13日）

“我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分子，那有什么好的？要枪毙就枪毙、要怎么就怎么，为什么不处理！”（1971年12月22日）

“什么反党集团！我是反错误路线。我又没跑，又没自杀，是什么反革命？撤了我国防部长，等于杀了我的头。什么社会主义，拿我彭德怀当帝国主义。”（1972年11月21日）

想到自己本是披肝沥胆为民执言，反而落得身陷囹圄备受羞辱；而那班草菅人命吹牛怕马阿谀奉承的小人，反而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每念及此就不禁悲从中来，任是曾统兵百万喋血沙场的大将军也难免潸然泪落：

“（彭）在桌子上哭了起来。睡了没两分钟又醒了，睁大眼睛思考着，一会儿眼泪又淌了出来。过了一会又哭起来。”（1971年8月8日）

“上午听说提审（彭）就流泪。”（1971年8月18日）

“（彭）躺铺上哭了一小时。”（1972年11月22日）

每当读到这些地方，想起那昏暗的监室里，一位孤苦无助风烛残年的老人在独自老泪纵横，而他就因为心系百姓挺身为民请命，却从叱咤风云的统军大元帅落到如此凄惨的下场，怎不叫人扼腕长叹不堪卒读！

也许是自身的遭遇令他深悟了这种“阶级斗争”的残酷及其不合理性，当彭德怀听说林彪事件时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认为林彪是咎由自取，反而是大有物伤其类惺惺相惜的感觉。当专案组宣布林彪反党事件，让其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时，彭德怀说道：

“不要着急。四五十年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慢慢地回忆回忆。”“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1972年1月8日）

“他们要我写林彪和高岗的材料。我不清楚。”（1972年6月9日）

其实彭德怀的记忆力是非常清晰的，在狱中他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情况下所写的《我的自述》对于数十年的经历叙述得历历在目，毫无差错。这里之所以不愿意写，是认为林彪和自己一样遭受了不白之冤，是因为“思想总感到不痛快”，彭德怀不愿意作出落井下石的行为。不知

这是不是与林彪当年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对他落井下石，反而为他洗清了一桩几十年的黑锅有关。实在被逼无奈了，彭德怀就说：

“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1972年6月11日）

这更毫无疑问的表明，他把林彪当成自己的难兄难弟了。材料写归写，心中却是一直为林彪鸣冤叫屈。1972年8月23日专案组正式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发（1971）57号有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彭德怀又一次显示了直言极谏的性格：

“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觉得林彪死得不清不白的大有人在，可试问当年有几个敢这样公开置疑中央文件的？自己已经是百罪莫赎死有余辜了，却还要冒罪加一等的大不韪为曾经批判过自己的人叫撞天屈！其秉公任直的赤子之心实实可昭日月！

实在要他批判林彪则总是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没有一点能上纲上线的味道：

“林彪有四个方面（我）反对一、井冈山（说我）放弃根据地；二、会理会议推彭德怀上台实际上是他自己；三、解放战争对打败蒋介石有怀疑，炸鞍山钢厂；四、他对抗美援朝不满，说中国和美国物资差别太大，不能打。”（1973年10月19日）

既是秉公任直就必然疾恶如仇，对于那些苟容屈从的谰言佞语，彭德怀总是理直气壮严加驳斥。1973年6月10日看了署名叶进的奉命文章后，怒斥道：

“不调查就乱写。说我们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总路线，攻击社会主义，破坏工业战线。我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一看，就知是不是攻击。我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叫叶进，投机分子，阴谋家，不讲真理、不调查就乱写。”还说“康生是阴谋家、野心家。”

虽然迫于形势和高压，彭德怀不得不在各种场合下作出检讨，承认“错误”。可他心里没有一刻屈服过。在挂甲屯吴家花园他亲手种地验证了亩产万斤的荒谬。而此时临近暮年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甚至推翻了自己作的检讨：

“我改造什么？想让我屈服？不管什么人，多大权力，多大官，我都不怕。”（1973年12月30日）

“我死不悔改，将来还要翻。”（1974年3月24日）

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种长着“花岗岩脑袋”的“反革命份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批倒批臭，批到他去见上帝为止。身患癌症的彭德怀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治疗，受尽病痛的折磨：

“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1974年7月21日）

“为什么今天这样疼，疼得厉害。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1974年8月19日 深

夜2点)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带着诉不尽的冤情和愤恨离开了这个他无限眷恋的大地和生活在上面的人民，享年76岁。在那人妖颠倒万马齐喑的岁月里，彭德怀的不屈抗争和呐喊无疑是如同凤毛麟角般的珍贵。我们纪念彭德怀就是要让那种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岁月永远没有再现的机会；让彭德怀这样的英雄永远不再受到那样的冤屈；让我们的民族永远摆脱愚昧和迷信的控制，早日跨进先进的文明社会。

□ 文中引文均引自《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  
【资料汇编】

文革中的走资派

• 欧阳龙门 •

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六条”曾经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指南，但是“十六条”并没有定义什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没有提出判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客观标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以后被简称为“走资派”。毛泽东直到去世之前还在谈论“走资派”，说“走资派还在走”。但是，直到去世，毛泽东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可供操作的判别“走资派”的标准。

那么哪些人是“走资派”呢？毛泽东最初的想法是把所有的“当权派”都放到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去“经风雨”，让广大人民群众来鉴别谁是“走资派”。但是，这个方法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被指控为“走资派”。这当然不符合毛泽东最初设想的“走资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既然没有判别标准，就只好依赖“列举法”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刘少奇、邓小平无疑是“走资派”，毛泽东也说过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走资派”。但是，毛泽东不可能列举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的“走资派”，于是中央只好列举出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走资派”，再往下就没有办法了，就由各地各部门革命委员会去决定了。

1967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该《通知》决定：“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批准在报刊上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34名“走资派”。这55名“走资派”的名单和当时的职务见附录一。

其中没有刘少奇和邓小平。从1967年4月起，公开的报刊上都是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指代刘少奇，用“党内另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指代邓小平。直到1968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公开的报刊上才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则一直没有在公开的报刊上被点名。

从1967年开始，尤其是在1968年，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在各

地上报的有关革命委员会组成人选的文件上，中央往往在批准的文字中列出中央以及当地的“走资派”。在这些文件中，“走资派”的排名大体上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有时会加上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对这些人的称呼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此外针对不同的地区还会加上不同的人，如西北地区的各省、自治区会加上高岗、习仲勋、刘澜涛，西南地区的各省、自治区会加上李井泉，中南地区则加上陶铸、王任重。接下来便是这些人在相应某个省、市自治区的“代理人”或“追随者”，见附录二。

“文革”前，全国共有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 1 2 5 3 人。附录一、二列出了 8 2 人，加上刘少奇和邓小平共是 8 4 人。这还只是经中央批准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以及部分在中央文件中点名的，就已经达到了 6 ． 7 %，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最初设想的“百分之一、二、三”。事实上，由各地各部门立案审查而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司令部代理人”的有 4 5 3 人，占总数的 3 6 %。受到冲击范围更大，达到 1 0 1 1 人，占 8 1 %。

在 1 9 6 6 年 1 0 月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议上，周恩来曾提到被打倒的干部“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百分之一、二、三。毛泽东回答说：“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方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然而，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是文革之后所有人全数平反。

参考资料：（略）

附录一： 1 9 6 7 年 8 月，中共中央批准在报刊上点名的走资派：

彭真（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彭德怀（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元帅、前国防部长）  
陆定一（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  
罗瑞卿（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  
杨尚昆（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周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部副部长）  
萧望东（文化部代部长）  
薄一波（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经委主任）  
吕正操（八届中央委员、铁道部部长）  
林枫（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安子文（八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  
杨秀峰（八届中央委员、最高法院院长）  
蒋南翔（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吴冷西（人民日报总编辑）  
张闻天（八届中央委员、前外交部副部长）  
张劲夫（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国家科委副主任）  
韩光（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国防科委副主任）  
陶铸（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副总理、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顾问）  
王任重（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李井泉（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  
贾启允（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阎红彦（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1 9 6 7 年 1 月自杀）  
汪锋（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欧阳钦（八届中央委员、前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

李范五（黑龙江省长）  
乌兰夫（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王铎（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  
王逸伦（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  
王昭（青海省长，1970年2月去世）  
任白戈（重庆市委第一书记）  
王鹤寿（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鞍山市委第一书记）  
刘澜涛（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  
习仲勋（八届中央委员、前国务院秘书长）  
胡锡奎（西北局书记）  
马明方（八届中央委员、东北局第三书记）  
陈丕显（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曹获秋（上海市市长，1976年去世）  
杨西光（上海市委书记）  
万晓塘（八届中央委员、天津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9月去世）  
张淮三（天津市委书记）  
林铁（八届中央委员、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李葆华（八届中央委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叶飞（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文敏生（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  
赵文甫（河南省委书记、副省长）  
赵紫阳（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方志纯（江西省委书记、省长）  
廖志高（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赵林（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杨静仁（宁夏区党委第一书记）  
马玉槐（宁夏区党委第二书记）  
陶鲁笭（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卫恒（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自杀）  
王谦（山西省委书记、省长）  
王大任（山西省委书记）

附录二：1967至1968年，中共中央文件中点名的部分走资派：

贺龙（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  
谭震林（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  
萧华（八届中央委员、总政治部主任）  
杨成武（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代总参谋长）  
江渭清（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陈光（江苏省委常委书记）  
王延春（湖南省委书记）  
黄岩（安徽省委书记、省长）  
赵守一（陕西省委第二书记）  
李启明（陕西省委书记、省长）  
顾卓新（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喻屏（辽宁省委书记）  
周桓（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委书记）

黄新廷（成都军区司令员）  
郭林祥（成都军区政委）  
赵健民（云南省委书记）  
范式人（福建省委第二书记）  
侯振亚（福建省委书记）  
贺希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谢王岗（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周仁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副主席）  
王其梅（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  
武光（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副主席）  
吕剑人（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张仲瀚（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新疆军区副政委、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  
伊敏诺夫（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包尔汉（前新疆人民政府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

【旧文今赏】

相隔不到半年的两首水调歌头词

• 郭沫若 •

◇ 水调歌头 • 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1976年5月12日）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 水调歌头 • 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  
【历史资料】

林彪是现代中国的孔子

•《文汇报》•

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林彪是现代中国的孔子。他们说的话一样，做的事一样，罪恶目的也一样，都是妄图开历史倒车。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实际上是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对革命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批林结合批孔，是广大革命人民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进一步深入，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进攻战，是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这场斗争，将使我们更好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批林、批孔斗争，我们汇编了这组资料。

1. 林彪的反党政治纲领和孔孟的复辟倒退路线

孔子是反动的、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的政治路线是复辟日益崩溃的奴隶制度，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他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鼓吹奴隶主专政的“仁政”，恢复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扼杀新生事物，叫嚷“正名”，推行愚民政策，施展虚伪的手法，无所不用其极。林彪是混入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他的反党政治纲领就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把孔子的“克己复礼”，即到退和复辟，作为万事中之最大的事，叫嚣要“解放”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林彪宣扬孔子的“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污蔑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破坏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林



彪惯用狡猾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策略，大搞阴谋诡计，妄图从堡垒内部来夺取堡垒。可见，林彪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现代中国孔子！

## 2. 孔孟的“克己复礼”与林彪的抢班“夺权”

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是奴隶制行将崩溃的剧变时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周天子已经不能对诸侯发布政令和军令了，各国诸侯的权力有些落到了大夫、陪臣手中。奴隶到处起义，革新力量积极活动。孔子胆战心惊，提出了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克己复礼”。孔子代表着没落奴隶主阶级，妄图恢复日益崩溃的奴隶制度，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他狂叫：“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意思就是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孔子的“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贵族奴隶主统治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秩序。为此，孔子又疾呼要“正名”，妄图挽救奴隶制度。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君请你去治理国家，你准备首先干什么事？”，孔子回答：“最要紧的是正名罗！”关于“正名”，孔子有一句“名言”，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古代孔子的反动纲领“克己复礼”被现代孔子林彪用来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大肆吹捧孔子的“克己复礼”一再强调“惟此为大”，充分暴露了林彪一伙迫不及待地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不仅如此，他又提出了他的反党政治纲领，阴谋抢班夺权。他夸张地说，“要设国家主席，不没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甚至原封不动地用孔子的话来为其反党政治纲领张目。孔子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名分和“忠君”思想来镇压奴隶起义，压制新兴地主势力的斗争，林彪则大肆鼓吹法西斯的“绝对服从”论，要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服服贴贴”地听他“指挥”和“调动”；谁不服从他的指挥棒，敢于抵制，他就“诛之”、“讨之”，甚至还要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林彪还学着孔子的腔调，讲什么“亲亲、尊尊、长长”，鼓吹要效忠林家父子的反动思想。林彪宣扬“克己复礼”，鼓吹“正名”。就是要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对内是为了搞资本主义复辟，对外是为了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人民。

## 3. 孔孟的“兴灭国”与林彪的“政治上的解放”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孔子在二千多年前提出的反动口号。林彪和孔子是一丘之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二千多年后，林彪又通过孔子的口号，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较量。

孔子提出“兴灭国”，就是要复兴已经被灭亡了的奴隶制贵族的国家。春秋时代，奴隶制迅速崩溃，孔子就是要复兴这些奴隶主专政的“国”。林彪继承了孔子的衣钵，大力宣扬从周朝以来的几千年的政变史，蓄谋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方法，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建立一个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让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王朝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国”在小国复辟。

孔子提出的“兴灭国”，就是要维护周朝的诸侯分封制。周灭殷后，把征服的地区分为若干区域，封给周统治者的子弟、亲戚、功臣，建立了诸侯国家。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也是要复辟周朝的分封制度。孔子的政治路线，是地地道道的分裂倒退路线。林彪全盘接受了孔子的搞分裂的政治路线，妄图分裂我们的党，分裂我们的军队，分裂我们的国家。他制造“上层和

下层”的矛盾，“这股力量与那股力量”的矛盾，兴风作浪挑拨离间，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叫喊要“权力再分配”，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梦想另立中央，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孔子高喊“继绝世”，就是让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继续下去。他的继承者孟轲更是喋喋不休地叫嚷要保持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使奴隶主贵族世袭官职，代代相依永享富贵。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上就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把我们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绝世”。林彪一伙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林彪的所谓“民”，就是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就是要让地主、资本家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重新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夺回他们已经丧失的“世袭”特权。林彪和他的儿子妄图搞什么“父子相传”的丑剧就是要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永远“传”下去。

孔子狂叫，“举逸民”，就是要把已经倒台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林彪及其死党则拼命要我们无产阶级对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孔子的“举”就是林彪的所谓“解放”；孔子所谓的“逸民”，就是林彪所依据的“地、富、反、坏、右”。林彪不但要“解放”被打倒的反动派而且还要“破格重用”这些极端反动的家伙，把他的死党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安插到党政机关的要害部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时间虽然相隔二千多万年然而，新老孔子喊的反动口号，干的卑鄙勾当，却象是一个模子中铸成的！

#### 4. 孔孟的“仁政”与林彪的反“暴政”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即所谓“爱人”，他还拼命提倡“忠恕”。“忠”，就是要奴隶服从于奴隶主，“恕”，就是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没落的奴隶主实行宽恕。两者都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奴隶的“犯上作乱”和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抬头。在他看来，奴隶们规规矩矩地服从奴隶主的统治，忍受压迫，就是达到了“仁”的境界。孔子反动思想的继承者孟子更是到处向统治者兜售“仁政”、“王道”，侈谈“仁义道德”，什么“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事实上，孔孟的“仁政”就是残暴的奴隶主专政，对于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来说，无非是压迫和奴役而已。孔子当上了各国的司寇并代行宰相的职务，上台才七天，就把当时鲁国一位著名的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杀了。孟子则咒骂厉行变法的秦孝公和商鞅是“暴君”、“污吏”，这就是对孔孟“仁政”的最好的注释！

我们现在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林彪这个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妄图阻挡历史前进的潮流，梦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因此孔孟的“仁政”被林彪吸收和发挥为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林彪一面大肆吹捧孔子的反动政治思想，把孔孟的“德”、“仁义”、“忠恕”一类反动黑货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把孔子的“仁”、“勇”、“智”说成是“团结”、“斗争”、“唯物论”，用儒家的反动思想冒充并修改马克思主义，赤裸裸地继承封建糟粕，作为他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武器。一面疯狂地咒骂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林彪立即跳出来恶毒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还搬出唐朝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诗来咒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林彪还把孔孟的“仁政”作为武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林彪在暗地里攻击我们对那些被赶下台的反动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讲“忠恕”，是“做绝了”，正当亿万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林彪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用儒家的语言，鼓吹“持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恶毒攻击革命暴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把自己打扮成反“暴政”的英雄，其实是为了搞他的法西斯反革命暴政。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林彪搜罗死党炮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磨刀霍霍，杀机四伏，丧心病狂地竟要谋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其心何其毒也！这个现代中国的孔子，还要他的死党“不成功便成仁”，和孔子要他的门徒“杀身以成仁”何其相似乃尔！

## 5. 孔孟的“不可使知之”与林彪的“不理解也要执行”

凡是反动派都是极端害怕群众掌握真理的。他们总是要推行反动的“愚民政策”。孔子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把人的生死祸福和社会的富贵贫贱的等级制度说成是由“天命”决定的，这是孔子愚民政策的理论基础。他还更露骨地说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对于劳动人民，只要让他们当牛作马，绝对不能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而做。孔子这句话成了历代剥削阶级愚民政策的金科玉律。为了实行愚民，孔子又用所谓的“礼”把人们的视、听、言、动都限制起来，只许人们在孔子制定的“礼”的范围中思想和行动，这就是他所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最终目的是妄图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度。

林彪把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乔装打扮一番，抛出了现代的新式愚民政策。他竭力反对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让人民群众掌握革命真理，胡诌什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同时把自己的修正主义黑货抛出来，强迫群众学习和讨论。为了灌输他那一套反动思想，林彪把自己和他的儿子吹成是“高于群众，高于历史”的“超群之才”。“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要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作他们的“驯服工具”，按照他的反革命意志办事。林彪的愚民政策归根结底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但是一切搞“愚民”政策的反动家伙最后都被革命人民所打倒！

## 6. 孔孟的“天下无道”与林彪的三个“变相”

孔子是维护反动奴隶主统治的顽固派，也是一个摧残新生事物的老手。这个连做梦都想见到“周公”的复古分子，竭力鼓吹复古，要人们行古代的历法，坐古代的车子，戴古代的帽子，唱古代的音乐，而对新生事物，则恨得要命，怕得要死，污蔑新生事物的出现是“天下无道”，想方设法予以扼杀。孔子所在的鲁国，在公元前五九五年实行“初税亩”，标志着由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向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转化。孔子很反感诬蔑“初税亩”为“非礼也”。春秋末期，奴隶不断起义，新兴的地主力量兴起。有些倾向于进步的人，作“刑书”、“铸刑鼎”，对贵族和奴隶的关系，规定了一些法律和条文，并且铸在鼎上。这对奴隶主有些限制，孔子就非常看不惯，气愤地说：将贵族和奴隶混在一起，怎么显示贵族的尊贵呢？还成个什么奴隶制国家呢？孔子又在编《春秋》时，用贬低和讥讽的手法，反对新生事物。公元前四八二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势力代表陈恒杀了齐国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孔子在《春秋》中，不仅写上“齐陈恒执其君”，而且又写上“齐人弑其君”。不厌其烦地要声讨陈恒的所谓弑君之罪。而对奴隶起义，在《春秋》中孔子却只字不提，一笔抹煞。

现代中国的孔子——林彪，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说成是“最权威的”“强国”。而对革命的新生事物总是恶毒攻击、恣意扼杀，或者造谣污蔑，无中生有，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早在井冈山的斗争时期，林彪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充满着强大生命力的红色根据地表示悲观失望，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主义论调，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又竭力吹捧蒋介石的力量，否认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时刻，林彪过高估计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看不到蒋家王朝很快就要覆灭的命运，不敢夺取胜利。全国解放以

后，在我党准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林彪跟着刘少奇鼓吹不堪的“四大自由”，妄图发展资本主义，扼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新事物，解放后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得到飞跃的发展，林彪反党集团却诬蔑为“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林彪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刻骨仇恨，采用种种卑劣手法破坏这场大革命并且千方百计抵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林彪面对新生事物，咬牙切齿，破口痛骂。污蔑新生事物是“变相劳改”、“变相失业”、“变相剥削”，企图煽起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社会思潮。反对新生事物的孔子和林彪最终都被新生的革命力量所抛弃！

## 7. 孔孟的“复井田”与林彪的“大家发财”

古今中外一切复辟派，要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必然要复辟旧的经济基础。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奴隶主头子把他的世袭垄断的土地划成豆腐干式的方块块，授予各级奴隶主贵族，各自按照划定的土地范围享受俸禄和占有奴隶。这种土地制度在孔子、孟子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土崩瓦解。孟子为了重建垮了台的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狂呼“复井田”。他向奴隶主国君献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要实行奴隶主的“仁政”，就要恢复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所谓经界就是“井田”的土地界限。这个孔家店的二老板大开空头支票，“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妄图用“不饥不寒”为诱饵，把封建制下的小农重新沦为一无所有的“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为奴隶主保持其“恒产”。

“井田制”是奴隶主专政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林彪在政治上搞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同时竭力鼓吹恢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早在我党准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林彪就跟着刘少奇鼓吹搞资本主义的“四大自由”。林彪还公然用资本主义冒充共产主义，用资本家的语言说什么要“大家发财”，大谈抽象的“产”字。林彪又象孟子那样开出空头支票，用所谓“安居乐业”为诱饵，叫喊：“经济上”要“得到真正解放”。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早就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过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幸福生活。林彪叫嚷经济上要“解放”，就是要在我国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确实，二十几年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过去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被我们剥夺了，政治经济上都被打倒了！林彪鼓吹经济上要“解放”、“大家发财”，就是要“解放”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让资本主义泛滥让地主资本家重新“夺回”工厂和土地，重新剥削和压迫工人和农民。

## 8. 孔孟的“巧伪人”与林彪的两面派

古代的孔子和现代的林彪都是搞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家，也都是十足的伪君子！

春秋时期奴隶起义的领袖跖说孔子是一个“巧伪人”，真是十分恰当。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是孔子的为人哲学。他论“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鼓吹“以屈求伸”的反革命两面派策略。为了复辟奴隶制度，应该“忍耐”，加以伪装，伺机而动。他公开主张“直在隐中”，恬不知耻地说什么父亲偷了羊，儿子进行包庇隐瞒就是“直”。孔子这样说，也这样做。孔子明明是一个官瘾极大的人，三个月做不上官就“皇皇如也”，而在口头上却一本正经地表白自己不想当官，说“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表面上讲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他每时每刻都在为奴隶主的反动政治而奔走献策，他搞教育编历史书，也是他搞反革命政治投机的手段！

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是孔子搞两面派的又一手段。孔子曾经堂而皇之地宣布“君子，群而不党”。事实又是怎样呢？孔子大力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维护奴隶制度的人，形成了一个以复辟奴隶制度为宗旨的学派或集团，并亲自率领，周游列国，到处兜售他的反动政治主张！孔子不但结党而且又排除异己。把帮助新生地主势力进行改革的学生革出教门，甚至举起屠刀把法家的先驱者少正卯杀了！

孔子在生活上也是一个极顶虚伪的人，他一方面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事实上，他的生活方面很讲究，是一个“食不厌精”的家伙，可见，孔子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

林彪梦想在中国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但是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可背，林彪四处碰壁。因此，他必然乞怜于搞阴谋诡计来实现他的反革命罪恶目的。他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改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是林彪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一招。他说：“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完全是孟子“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那一套处世哲学。长期以来，他喊着“高举”、“紧跟”的漂亮口号，把自己打扮成“志壮坚信马列”的“英雄”。实际上，他把马列著作污蔑为“过时”，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到顶”。他在表面上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林彪”，背后却在磨刀霍霍，妄图谋害我们的伟大领袖。在会上，他激动地表示“准备让贤”，背后却加紧抢班夺权。

结死党，搞阴谋，这是林彪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又一绝招。阴谋家林彪曾经假惺惺地说：“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可是行动上呢？林彪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以林彪为中心，“以我划线”，“任人唯亲”，无耻地吹捧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组织“联合舰队”，要“争夺领导权”。林彪口头上还讲什么谁“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可是，他自己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网罗死党，私订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妄图有计划、有步骤地搞武装政变。用心何其毒也！

反革命两面派林彪还高唱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可是，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寄生虫的那一套，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

## 9. 林彪的反党理论纲领和孔孟的哲学体系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社会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的时期。在这个新旧社会的大变动中，孔子顽固地维护腐朽没落的奴隶制，是一个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派。为了推行他的复古、倒退的政治路线，孔子在精神与物质、认识与实践、个人与群众等哲学的根本问题上，抛出了一套极端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长期以来，流毒甚广，危害极大。

林彪处于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是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复辟地主资产阶级已经失去的“天堂”。林彪和孔子所处时代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反动立场和反动思想体系则完全一致。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是现代中国的孔子。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的反党理论纲领，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同孔孟的哲学是一脉相承的。

### 10. 孔孟的“生而知之”与林彪的“天资”、“天分”

在哲学思想上，林彪完全继承了孔子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并大肆鼓吹从孔孟那里捡来的这种破烂货。

孔子最先提出世界上有“生而知之”的“圣人”，认为有的人，从娘胎里生下来就带有先验的知识。孟子继承孔子的农钵，鼓吹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更明白表示人的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用不着后天的学习和实践。

林彪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尽管贴了新的标签，但戳穿了一看，原来完全是从孔孟那里搬来的。林彪到处鼓吹有些人生下来就有“天赋”、“天资”、“天分”，有些人是“天生就知”、“天生就懂”、“天生就会”，他的同伙也宣扬“先知先觉是有的”，“聪明”和“愚蠢”是“先天造成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林彪还厚颜无耻地胡说什么：“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这些谬论，同孔孟提出的唯心论先验论，完全是一脉相承，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人的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这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同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分水岭。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知识、才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林彪根本否认人的认识是头脑对于外界事物的反映，否认知识来源于社会实践，颠倒精神和物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用先验论对抗反映论，这正表明林彪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是孔孟哲学体系的继承人。

### 1 1. 孔孟的“内省”、“慎独”与林彪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孔子从唯心论先验论的世界观出发，必然导致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就是说，人的感觉器官不必去接触外界只要闭门修养，从心灵中体验上天所赋予的先验的知识、先验的道德规范就行了。在《论语》一书里，通过曾子之口，最先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内省法”。孔子认为，“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并且认为只有“君子”才可以用“内省法”来体验固有的先验知识，“小人”是没有条件用这种方法的，即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孔子的“内省法”，被他的徒子徒孙继承下来并大大加以发挥。子思提出“慎独”，要一个人独自呆在房里，从内心的反省中进行修养。孟子提出了“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以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到了宋朝的陆九渊，更荒谬地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明朝的王阳明，又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谬论。

林彪鼓吹的“要解决问题，就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要“先搞主观世界”，然后再“从主观到客观”。这套东西，完全是孔孟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林彪自己把他的这一套叫做“倒过来”，这三个字，正是不打自招地供出了他是现代中国的孔子。林彪的“倒过来”的哲学，把人的主观感觉“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这同孔孟所主张的关起门来通过内心修养就能获得人心中所“固有”的知识，完全是一路货。林彪鼓吹这套谬论，就是妄图引诱人们脱离革命实践，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反对革命人民在实践中改造世界，使之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 1 2. 孔孟的“上智”、“下愚”与林彪的“超天才”、“马大哈”

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认识人民群众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必然走向“英雄创造历史”的天才史观。

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认为奴隶主“圣人”是上等的有智慧的人，奴隶不过是下等的奴才，一个是绝对的智慧一个是绝对的愚蠢，“上智”与“下愚”是天生的，永久不能改变的。孔子还划分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不可小

知”，“小人不可大受”，“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就是说君子身负重任，统治人民；小人是“蠢才”，只配“务力”，接受君子统治。孔子讲“天生德于予”，把自己捧为“天才”。孟子不甘落后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也把自己捧为属于孔子一类天生的伟大人物。

林彪和孔孟一样，把自己打扮成是“天生”的“伟人”，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至贵”、超人。林彪宣扬只有他们这些“先知先觉”的“伟人”才能“开发民智”，“启蒙”人民，即所谓“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只要他们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世界就会“改变面貌”。林彪一伙还大肆诬蔑劳动群众，把群众说成是“愚昧无知”的“群氓”和“马大哈”，污蔑人民是“一盘散沙”，知识“低下”，是“落后而黑暗的人”，只知道“恭喜发财”，“招财进宝”，“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总之一句话，群众只能拜倒在他们脚下，“服服贴贴”听由他“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心史观，必然要导致神学和僧侣主义。孔子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子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董仲舒说什么“君权神授”。林彪则鼓吹“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认为他们的“温文、豪放、理智”，都是“受于天”的。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斗争的焦点。林彪把孔子的唯心史观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文化的源泉”，完全是别有用心无耻捏造，也是林彪为了掩盖他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的罪恶阴谋。孔子与林彪的历史观，是一脉相承的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

### 1 3．孔孟的“不偏不倚”与林彪的“两和皆友”

孔子为了挽救奴隶制的危亡，妄图阻止奴隶的反抗，还提出所谓“中庸之道”的哲学。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就是说中庸这种道德，是最高的了。又说什么“过犹不及”，“和为贵”，“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孔子的孙子子思和子思的学生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中庸之道，说什么“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宋朝的程颢、程颐、朱熹，特别强调中庸之道，说什么“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被孔子和他的徒子徒孙讲得玄妙莫测的中庸之道，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从哲学上说，所谓中庸之道，就是调和矛盾，搞折衷主义，即所谓“不偏不倚”，“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作为一种历史观，中庸之道就是要维护旧的社会制度，否定社会的变革，主张复旧、倒退，反对发展和进步，是地地道道保守、反动的哲学。

但是，林彪却把孔子的中庸哲学如获至宝地承接过来，胡说什么：“中庸之道……合理”，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说中庸是“辩证思想”“对于我国后来辩证哲学的发展”“有其很大的影响”，“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林彪提出什么“防止对立越过了限度”，“不过极则成”。“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他们还提出要学习孔子卫道者朱熹的“待人”哲学，对事要“不置可否”，对人要“面带三分笑”，谈话要“不失言”，还说什么“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凡事勿做绝了”。还把孔子的这一套，吹捧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林彪鼓吹孔子的中庸之道，用形而上学和折衷主义来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就是他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在哲学上的反映。

### 1 4．林彪培养复辟“人才”和孔孟的反动教育思想

孔子为了维护正在崩溃的奴隶制，还拼命抓教育，利用文化教育阵地宣扬维护奴隶制的反动舆论，搜罗和培养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忠实走卒，帮助奴隶主贵族搞反攻倒算。地主资产阶级

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是孔孟之道的狂热鼓吹者，他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没有放弃教育领域这个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总是阴谋把教育作为复辟的重要渠道。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就是林彪一伙用来培养复辟人才的反动思想武器。

#### 1 5. 孔孟的“学而优则仕”与林彪的“一本万利”

孔子的一部《论语》很多地方谈的是做官、“问政”、“问事君”、“问干禄”乃至“问仁”、“问礼”……无不同做官有关。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是孔子为奴隶主培养人材的办学宗旨。孔子对他的门徒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就是说，种田，会饿肚皮；读书，就可以做官。孔子还给学生定下了一条做官的原则：“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而且要“守死善道”，也就是说必须按照奴隶主阶级的正统观念办事，忠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事业，绝不能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效劳，甚至要以自己的生命来保全周公之道。孟子更是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还说这是“天下之通义也”。

叛徒、卖国贼林彪继承了孔孟的反动教育思想，他在教育领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其目的是妄想把我们的学校变成培养地主资产阶级卫道士的场所，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他胡说什么：“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这完全是“学而优则仕”的翻版。林彪的路线代表的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他要复辟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他也象孔子要奴隶忠于奴隶主一样，要人们忠于林家父子，把它作为“高于一切的大节”、毕生的战斗“使命”。他对“忠”于他的路线，听命于他的指挥的死党，大力培植重用；而那些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则把忠于林家父子看作是“认准门，看准人”的“集中投资”，只要能这样做，就被认为是“头号大好”，得到“保一批，升一批”的优“禄”待遇。林彪甚至公然叫嚷：“我希望大家当董仲舒。”这就是要他的那一伙及其黑爪牙都要“独尊儒术”，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卖命的奴才。然而，如同孔老二妄图复辟腐朽的奴隶制必然碰壁一样，林彪一伙连同他所供奉的孔子牌位，也无例外地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 1 6. 孔孟的“不学稼圃”与林彪的“变相劳改”

孔子鄙视劳动、敌视劳动人民的反动本性决定了他搞教育必然要脱离实践，特别是脱离人类最基本的实践——生产劳动。

孔子经常向学生灌输：“君子谋道不谋食”。就是说要当一个奴隶制的卫道士，只要用心学习奴隶主贵族的一套道理，不必去关心什么生产劳动。无怪乎樊迟问怎样种田、种菜（稼圃），孔子要破口大骂：“小人哉，樊须也”。在孔子看来，种庄稼之类的事是奴隶们干的，是最没有出息的。他希望于他的学生的，就是要作“君子儒”，不作“小人儒”。孔子“诲而不倦”的就是要其弟子做脱离生产劳动的“君子儒”，即脱离劳动群众的反动知识分子。

林彪站在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接过孔子的一套，极端轻视工农，鄙视劳动，恶毒地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变相劳改”。林彪反对青年参加生产劳动，却要青年学孔子“韦编三绝”的读《易》精神（古代的书是刻在木、竹片上，用皮绳串起来。孔子把系书用的皮绳子都翻断多次），就是要人们关起门来读死书。他这样做的目的同孔子把复辟行将崩溃的奴隶制寄托于其弟子身上一样，是妄图引诱青年一代脱离劳动，脱离革命实践，脱离群众，成为执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驯服工具。

#### 1 7. 孔孟的“博学于文”与林彪的“五分”、“尖子”

没落奴隶主贵族学阀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推行“智育第一”的老祖宗。他诲导学生，褒贬



门徒，总是把奴隶主贵族的六艺——诗、书、礼、乐、射、御放在第一位，要学生“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谁笃信周公之道，精通六艺，就是学得了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的“真谛”。孔子“循循善诱”，是要诱导他的门徒，一心读通复辟奴隶制的书，从思想到语言全盘接受他的一套东西。这样的“智者”，在政治上，要死守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反动立场，做明知不行也要干到底的顽固派；思想上，要相信天命，按周礼的要求去麻痹人民；在道德上，要按照“仁”的标准处理好奴隶主阶级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总之，孔子的“智育第一”，就是奴隶主政治第一，就是要培育出这样的复辟旧制度的“智者”来。

阴谋家林彪根本不懂教育，却偏要装腔作势装出一副很懂教育的样子，胡说什么科学技术以能搞上去，就是因为“大学生多，五分多，尖子多”。公然鼓吹“智育第一”、“分数挂帅”，要青年学生钻进书堆，拜倒在分数面前，成为孔子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为推行他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服务。他用“分数”做诱饵，作挡箭牌，妄图抹煞无产阶级教育的阶级性，以便地主资产阶级继续垄断文化教育，利用这个渠道，培植他们的代理人，在上层建筑搞倒退复辟。

## 1 8 . 共同的立场，相同的下场

林彪同孔子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他的反动立场与孔子是一致的，他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妄图恢复旧的生产关系，拼命想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思想同孔子是相通的。孔子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疯狂地反对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社会变革。他到处奔走，千方百计地想挽回奴隶制覆灭的命运。孔子的一生，就是搞复辟活动的一生。

林彪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的一切反革命活动，也都为的是复辟地主资产阶级已经失去的“天堂”，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退。一个是一心“为东周乎”，虽然到处碰壁，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个是反党阴谋败露后，还狂妄地叫嚣：“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收回！”一个到最后无可奈何地哀叹：“如果我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了，我就乘着木筏到海外去”，准备“乘桴浮于海”，投奔外国；一个是声言要求救于“核保护伞”，准备一切依靠苏修新沙皇的“力量”，最后，阴谋破产，仓皇出逃，折戟沉沙。他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为没落的剥削阶级奔走卖命，至死不悟；他们结果都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派，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 原载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文汇报》

~~~~~

【往事如烟】

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十）

• 老 田 •

（续上期）

1976年二三月中央打招呼会议过后，省里面派蔡协斌和汪友根到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来，帮助重庆落实政策。他们跟我讲，说你是工厂里面起来的造反派，中央很关心你，我们这一次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你的入党问题。在中央会议上江青同志、春桥同志都很关心你。又问是不是你曾经写了一首诗给江青同志，她看了之后觉得诗很好，把这首诗谱成歌曲发到全国去唱，她说你的革命意志很坚定。你的入党问题周总理也很关心，重要的是你和鲁大东的关系不好，鲁大东抓工业是个内行。蔡协斌还说你的工作确实不是由省里来安排，我们这次下来做工作，

希望得到你的配合。文革已经结束了，你所做的事情，省里都知道，中央还是看得起你的。看来你要配合我们，要转变鲁大东对你的看法，你也要相信鲁大东搞好与他的关系。

他们问我对鲁大东的看法，我说鲁大东就是标准的走资派，有些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例如一号专案到如今不给老百姓说清楚，也不给大批受害者落实政策。汪友根说，老黄，我还有一些看法，今天这个事情，你要为周总理、江青同志争个气，主要的障碍就是你和领导的关系。我说既然你是下来做工作，就不要打官腔，哪个到单位里去做工作，是去发动干部抵制我吧，群众对我有很多意见吗，还是当权派对我有意见？入党是有很多限制条件的，要是我的立场和观点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是我本人的问题，这个党我就不该入了。他们说不要辜负中央领导同志的期望，不要骄傲自满，还是要按照组织程序来，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最后还是要在本单位履行手续，要在本单位支部讨论通过。

一次我在一号楼与岳林谈论转弯子的问题，他起先不高兴说你去找鲁大东，我对他这个态度很不满意，想到他是老红军，还在发哮喘病，就算了，不想跟他理论。我要走的时候，岳林说，据我所知，你的问题惊动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江青出来说了两三次，李大章也讲过，中央的态度冲不破地方阻力，除了别人的问题之外，是不是你也有霸道作风，你入党是不是有人认为有威胁，另外你长期脱离原基层单位，党支部看不到你，中央和省里面领导都做了工作，中央甚至催问这个事情，你还是经常回单位去。我回单位之后，支部书记是个女同志叫杨柏珍，我们还谈得拢。她说汪友根和蔡协斌来过，组织部也问过这个事情，她希望我经常回基层，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后来又听说江青在中央会议上说她要亲自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还叫出席会议的唐克碧跟她一起当介绍人，唐克璧说她不认识我而没有接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唐克碧没有被作为“三种人”扒下来，据说就是因为她曾经抵制过四人帮。

支部开会讲党课的时候叫我也参加，原来的同事看见我回去，觉得很亲切，就算以前派性最强的人，曾经说我是“假左派真右派”的人也没啥了。党课讲完了，大家都鼓掌要我讲话，我讲在革委会的工作。有一个储运员刘忠海愿意当我的介绍人，从前是八一五派的。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他们又起哄要我自己选一个入党介绍人，他们说你是个领导，你自己看这里哪个有资格介绍你。我就说要选一个老共产党员，而且又是从前反对我最激烈的人做介绍人。我就挑选石秀亭同志，她从前是反对我最凶的，说我投靠江青江妖婆。我说她是我的对立面，如果介绍错了，说明对我反对不彻底，如果介绍对了，说明派性已经得到了克服，结果她面红耳赤，也同意当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回去之后，才知道蔡协斌和汪友根真的去基层做工作了，以前只是隐约听说这个事情。不久公司总支委员会就全体通过了我的入党问题，要我填了表，第二个月就要我开始缴党费。我回到市革委会告知鲁大东，说我的组织关系解决了，问他组织关系是留在原单位还是转到市革委会来，他脸色铁青，说叫单位出个简报来。后来才知道鲁大东对我的入党问题是极力抵制的，是四川省委越过他直接去基层打招呼的。

根据鲁大东死后他的同僚所写的回忆文章，说是1976年2月份鲁大东在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和张春桥当面质问鲁大东“黄廉为什么不能入党？你们不介绍，我来当介绍人。”会后，四川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曾经专门召集重庆市鲁大东、丁长河、徐庆如三位书记到成都开会，会议的唯一议题是劝说重庆市委，同意江青点名的那个帮派头子入党。回忆文章说一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大东同志这次就是不顺从，还对其他两位书记打招呼，对此人的入党问题，市委不能同意，不能表态。

一次我和周家喻同志去省里，在从成都回重庆的路上，谈论到底什么是走资派，在经过沱江的时候，我们看到江上有渔翁凭借鱼鹰捕鱼，就停车下去观看，渔人在鱼鹰的颈子上加了一个套环，鱼鹰捉了鱼之后就无法下咽，渔人就把鱼鹰无法下咽的鱼取出来，丢进了他的鱼篓子。周家喻说那个渔翁的状态有点象走资派，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让那些鱼篓子永远也装不满的渔翁

来主导一切，渔翁们要想办法让鱼鹰永远吃不饱，这样子鱼鹰才会总是积极地去为他捕鱼，走资派也是要人民群众无休止地去为他们创造财富，而且他们还要尽量压低多数人的经济状况，这样人们才会象鱼鹰难以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乖乖地去接受少数人的敲剥。我们的心情也是非常沉重，许多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似乎纠结在一起，难于索解。

二十三、毛主席逝世之后

我们是突然得知毛主席逝世的信息的，感觉到就好像是晴天霹雳一样，市委要我和周家喻抓悼念工作，各个单位都设灵堂开悼念会。我回到木材公司去检查悼念活动，书记和副书记陪我入灵堂做入党宣誓仪式，回市革委会向鲁大东作了汇报，他听后好像受到莫大的打击，冷若冰霜，心不在焉地问我吃了饭没有。

下去看到有些群众在悲恸之中哭得昏过去了，有个别干部却在一旁风言风语，说死都死了，哭有啥子用，以后叫你们知道厉害。中央9月18日追悼会过后，花圈摔得到处都是，干部根本就不安排收拣。9月22日我到成都找赵紫阳，问鲁大东为什么那么敌对，赵紫阳说你还是要着重把计委工作搞好，与鲁大东搞好关系，他还说出现那些情况也不奇怪，阶级斗争嘛。我26号回重庆，整个城市一片悲伤，国庆节也没有怎么庆祝。每天从大参考看，中央也有些不正常，我分明看到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暗的东西压抑着，看够了那些老两面派的表演，很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十月八号就有群众来找我，说听到国外广播，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重庆大学传说出了大事，到十号的时候，政变谣言已经满街都是了。

18号中央17号文件传达下来了，在人大礼堂传达文件的时候，我坐在主席台上，念到华国锋任职时，满场掌声，周家喻拍得懒洋洋的，我双手抱胸，没有鼓掌。结果下面就有人喊起来“把黄廉拉下来”，官场上的积极分子们不放弃任何表现政治正确的机会。鲁大东的风度又回来了，他走到我的背后说等下出场你坐我的车，我跟本就不理。会一散，我从主席台背后走，官员们蜂拥而来要在我身上有所表现，我表面上装着无所谓，思想上体验到了一个政权将要覆灭的强烈感受，原来政权中间的聪明人，要抓住一切机会，踩着别人的鲜血爬得高一点，我很显然就是他们要表现自己的好靶子。每个人都在一霎那间都理清了思路：自己要为将来的升迁准备一点政治资本。到市委一号楼之后，钱敏说先去吃饭，鲁大东走过来问你事先晓不晓得，我反问他，他说不晓得，我说你跟邓小平那个好，他事先没有告诉你呀。

积极分子庆贺的鞭炮声不断，我住地对面是常规兵器办公室，晚上楼顶架起几挺高射机枪，对天射击整夜代替鞭炮。也有人敲锣打鼓表示他们很开心，第一批上街游行的是文化界的学校，我穿个军大衣，戴上棉帽子，把整个的游行队伍看完。我回到宾馆跟总服务台的寇玉林说，前几天还在毛主席遗像前哭得天昏地暗的人、举手发誓的人，都到那里去了。寇玉林说你讲话要小心，周围搜集情况的人多得很，鲁大东已经布置了公安局。

我从宾馆回到木材站，很多人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清楚，大概就是阶级斗争和政治变化吧。长安厂来了几个工人找我，说忍了吗？上山吗？有什么办法？也有人说要到体育馆去集合，准备上山打游击，我要他们不要冲动，造反派中间一片心事浩茫，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共产党的未来演变感到忧患万分。有人打电话给13军，回答说是“一级战备”，放假都没有了；打电话去民兵指挥部问李木森，回答说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他来了还不一定走得脱等讥笑言语，可以想见搞修正主义政变好容易了。有个军队的官员跟我开一个苦中作乐的玩笑：你想跑吗？我建议你去尼泊尔，他说他们曾经在边境驻防，可以叫边防军放我通过边境，我说我去尼泊尔干什么。

10月20日我去市委，当兵的拦住我不让进，说里头的领导在开会，我说我就是领导，他说大东同志让你在外面等一下。我看见公安局的几个人夹着材料匆匆离开了，大概是因为我回来了，就提前结束会议了。鲁大东问我这几天怎么没来，说这两天你们大概都很忙，真是说不出的和颜悦色。下楼梯的时候碰到常委蒋良志，他要我去宣传部门口看大字报，主要意思都是黄廉周家喻要老实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我说是不是要转回文革初期那样，由我们来当走资派挨斗，有个干部说恐怕还要恼火哟。

那个时候很多人一时间不知所措，思想一片混乱，老是希望出现奇迹，传说也是千奇百怪，有说丁盛要搞事，有说上海要怎么样怎么样。在那个情况下，来木材站来的人多了，我就回大坪家里去。看见兵器办公室的人朝天鸣枪当鞭炮，还传达了叶剑英“大吃大喝吃吃吃”的指示，我说你们也太浪费了吧，他们回答说现在我们自由了，你们还想批判我？

11月8日鲁大东喊我去市委办公厅会议室，鲁大东这一次得意忘形的样子也不想掩饰了，他把双脚翘在茶几上说，17号文件下达之后已经半个月了，你要好好思索自己的问题，你跟四人帮不是一般的关系。我说你当初反对过中央文革了，是靠都靠不拢吧，你现在是不是落伍了。他说文件下来半个月了，你还是这个思想，觉悟很差，态度很不对头，一个星期之后，你就带上用具去开会，会上你要表态的，今天我跟你谈话，是代表党组织和英明领袖华主席跟你谈的，你要认清形势。

二十四、从隔离到判刑

14号那天市委来了辆小车，我妻子问我还有什么会要开，我说此去恐怕不再回来了。我到达之后，鲁大东、徐庆如、钱敏都在，鲁大东拿出一个文件夹，说跟你宣读个文件，根据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四川的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从文到之日起，停止工作，不接电话、不会客，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说清与四人帮的关系和问题，什么时候说清楚，什么时候解脱。钱敏说你把与王张江姚的关系说清楚，取得党的谅解，我说你们的级别比我高，经常去北京开会，你们与四人帮的接触和联系比我多得多，需不需要也说清楚。

他们没有办法回答，鲁大东、钱敏和徐庆如都起身走了，屋子里剩下的就是保卫人员了，我起身去卫生间，就有两个保卫人员随行，过了一会军用吉普车就把我送回木材公司，一进大门，三个解放军战士就站在门口设岗，民兵参加值勤的就更多。三楼的一个房间，门窗已经被他们用厚木板加固钉死了，改造成临时的监舍。他们告诉我就是这里了，里面有四张铺，一个床是新铺盖，这是为我准备的，其他三个床都是监视人员从自家带来的。政法学院的一个主任柳传成说，他是市委“清查组”派来的，我和公安局的杨孙两位处长，在这里陪你学习，每天负责收集你的交代材料，我们早上8：30开始，下午是接待外调的时间，晚上6：30休息，去厕所解手要有人陪同；天气冷的时候，有人会给你送东西，本单位已经管不了你。我想要给周家喻家里打了个电话，看他是不是也被隔离起来了。这一个电话还没有打出去，门口又给我加了两个岗哨。经常有人冒充外调人员来找我谈话，本单位也有不少人走到楼梯口来看，由于隔离措施很得力，一般人无法接近我。

12月份就把我转移到五招待所去了，看守的卫兵就换成军分区一个排的正规军了，还有民兵，吃的东西拿进来需要经过检查。其间除了跟他们吵架之外，几年时间我一个字也没有跟他们写，也几乎不跟他们说一句正经话。有时我从缝隙里看到换岗人员往弹夹里压子弹，就不禁想起毛主席说“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1978年开始，我和周家喻就到各个单位轮流接受批斗，建设厂、重钢、二钢、望江厂、

江陵厂，大型企业几乎无一遗漏，每到一个工厂，本厂的头头就被拉上来陪斗，开始的时候我的职务还没有撤，批斗的时候还有坐着的待遇，后来越斗规模越大，在区里乃至川东都主持大型批斗会，公安局还接上大喇叭进行广播。有一次是弄到捍卫路科技情报所礼堂接受全市财贸系统的批判，出场批判我的基本上都是“倒戈人员”，没有倒戈的，就在台下站成一排，还要他们低头弯腰。出来揭批我的，是一位银行的女士，在十一年前是请我去作报告的长辫子姑娘，她的发言稿也许有一点言不由衷吧。在特钢批斗会上，陪斗的有王敢斗同志，他昂着头、瞪大眼睛的不屈形象，确实配称“敢斗”的勇士，看到许多同志的遭遇，我回去之后彻夜难眠。

在物质局批斗的时候，我要炊事员给弄点肉来吃，他用个大碗给我装饭，底下全是红烧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他说你们没有错，主席尸骨未寒就把他夫人给抓了，太不象话了，我听了之后心里很暖和，工人同志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以后每到一个单位，我就要炊事员弄好菜来吃，在南岸区批斗完吃饭时被人问起，炊事员回答说黄廉的伙食费是每餐一块钱，又公然给我舀一大碗羊肉汤。以后就得了经验，要主动跟炊事人员打招呼。在几次批斗的时候，有人假装跑上来质问、抓扯，暗地里趁机给我塞鸡蛋、纸条，有一次一个纸条上说：主席说他一生只干过两件大事，一个是建立新中国，一个是发动文革。我们才知道群众虽然不说话，但是心里还没有服气，以后他们就不让那些对我们很“气愤”的人随便上台来了。在我看来，毛主席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敢于暴露共产党当权之后的种种阴暗面，是他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无比的信任，否则绝对不敢发动群众对走资派进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产党掌权后的消极面和社会矛盾，特别是把当权派的真面目，统统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是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最大胆、最辉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没有任何执政者敢于动这样的手术。

在重庆大学批斗完之后，很多人跟在我们屁股后头撵，广播上喊：对于四人帮的黑干将，大家要拿出仇恨精神来，不要去看稀奇，你们跟着他们两个追赶什么。这个时候才跟周家喻上头，知道他也在五招待所二楼，我在三楼，袁金梁在一楼，大家都关押在同一个招待所。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和周家喻一同被押出去批斗，有时候是三个人一起，甚至我已经被关进看守所了，还从监狱压倒物资局拍批斗电影。峨嵋厂拍过一部电影《铁证如山》，是在人民大礼堂批斗时取的镜头，我押出去的时候，看见刘结挺带一个氧气包挨批斗，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极差；那个会很大，在全川广播了，批斗会宣布正式逮捕，公安厅说执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对黄廉周家喻执行逮捕。

在拘押审查期间，尽管十分困难，我仍然坚持每月按时缴党费。在宣布逮捕后的某一天，看守来请我出去签字，说你们木材公司党委通过：不承认你是党员。我说你有什么资格通知我，入党和开除党籍，都有党章规定的组织程序，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的“家家酒”吗？他们根据什么来承认，又是根据什么来不承认的？这样的搞法是极端不严肃的，是糟蹋中国共产党的信誉，另外一个看守也说，哪有通过了入党之后又不承认的，这是他们为了打击黄廉。我说你给我退回去，还请转告他们：黄廉不但不签字，还抗议他们这样无知行为。

在被非法关押了五年半之后，等到邓小平他们推翻了四届人大的宪法，又按照他们的需要制定了一套法律来整治我们，即便是按照他们自己颁布的法律也是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的，因此他们就公开进行枉法裁决以适应他们的政治需要。1982年进行公开审判，那天我一出监狱就看到摄影机，到会议室之后，检察员给我念起诉书副本，说公安局已经结束了侦察。正式开庭是82年春节假期过后了，那个时候我身体已很不好，他们送我去三医院看病，碰到一个熟人问为什么这么瘦，医生说为什么瘦，贫血、身体不好。我坚持不肯让他们抽血，也就算了。

公开审判一直进行了五天，常常上午是周家喻，下午是我。开庭回来之后有加菜，碗里有

十几片油炸的肉，他们要我在法庭上听话些，说审判完就好了。第一次审判是在政协礼堂，这个时候出门已经是正式的囚车了，我看到从监狱出来到礼堂，2000多米长的街道全部戒严了，机枪架起，阵仗很是吓人。把我押到被告席要我坐下，我就要站在那里，看台上坐的是些什么人，每个人的前面都有牌子，只有一个女人前面没有牌子，审判长介绍的时候也没有介绍她。庭长宣布开庭，宣布一下就往对面的楼上看一下，估计是有个什么领导在楼上坐着。然后庭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不回答，我说，你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把我弄来干什么？下面哄堂大笑。他们气得脸色发青，耐着性子跟我解释这是法庭程序，我说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然后才回答，他说你讲。我就问，那个女人面前没有标牌，她是什么人？是刽子手吗？法官气得要命，说我咆哮公堂，要罪加一等。

公诉人据说是重庆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姓雷的，在那里选读起诉书，说我跟随四人帮颠覆政府，这遭到我的严厉驳斥。我说我是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自己就是政府组成人员，自己颠覆自己吗？公诉人说提出抗议，说黄廉十分嚣张。我说：什么叫嚣张，我是一个正直守法的公民，而且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一不偷、二不抢、三没有杀人放火，你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把我关了五年，你们自己才是违法乱纪。然后他们就放幻灯片，说黄廉在建设厂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说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为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批邓是毛主席部署的，你们多数人自己就曾经亲自参加过，这么快就忘了吗？上午搞了两个小时就休庭。

下午是证人出庭，石有中出来作证，说黄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动员我们准备500辆卡车、5万斤粮食，准备上山打游击，问我是否事实？我说没有听清要再说一遍，他刚刚开始再说，我就说：石有中，你怎么这样卑鄙？他就再也说不起话，当时就想走掉。人看来不能干违心之事，干了之后，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的，这个人最后在精神上就垮下去了。

法庭又说我犯有反革命杀人罪，我就说请问审判长，有谁被我杀？动机是什么？死者是谁？在什么地点被杀？杀人工具何在？凭据何在？你这样的法官判案，冤案都不知道有多少？王旭说：黄廉，是我在审你，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我说，那还问什么，你不就是要把我问成一个反革命吗？僵持完了又休庭。我回监狱之后，说我咆哮公堂，这次加菜没有了。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老实把加菜送来，明天我就不出庭了，最后他们只好又端来了。

最后一天，我在法庭上进行最后陈述，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提出的三个问题，说根据检察院的起诉书和法庭的证据，文字和措辞的捏造改变不了铁一般的事实，完全不能证明我有罪，我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你们说我拥护四人帮，当时谁不拥护中央？有些人比我的级别高，跟他们有更直接的联系，直接执行他们的指令，你们怎么不追究？就算你们已经证明他们是“反革命”，也不能因有关系而定罪；文革中间是有严重的派性，问题主要在于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派派出工作组，组织搞抄家破四旧，形成打砸抢，毛主席宽容了他们，我自己就是他们资反路线的受害者，我们在文革期间屡遭迫害，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最后得利的是你们干部，我们造反派只有血泪的付出；在你们所谓的粉碎四人帮过后，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调查和事实，也是你们以捕代审关押我五年，是你们违法还是我违法？我是革委会副主任，你们没有任何手续就抓，是你们政变还是我政变？文革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领导并发动的，是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潮流，如果有错误也只能是中央负责，追究了江青还要抓群众，中国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我看世界上哪一国都没有这个道理！你们说仅仅是几个小丑就搞乱了几亿人口的国家，真是笑话奇谈；你们又把武斗的责任堆在我极力反对武斗并带头执行九五命令的人身上，你们是没有分清到底是谁在制造派性、挑起武斗。我根本无罪，你们是在闹一个历史的大笑话，我永远都不会服，历史将证明我无罪。末了我就喊毛泽东思想万岁，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资反路线要永远造反下去，警察不让我喊，拼命地用劲把我撑下去，把我的肩膀都弄痛了，第二天宣判就没有我讲话的机会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旭草草宣布判处我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限制我在10内向省高院上诉。我说我不服，我将向人民上

诉。审判长站起来大吼：将罪犯黄廉押入监狱服刑。

回到看守所，我感到世界一片黑暗；同时我开始讥笑自己：我真的读懂了《法兰西内战》吗？真的理解了什么是阶级斗争吗？真的懂得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真谛吗？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我奋笔写下了自己的上诉书。上诉到省高院被驳回，省里面派高院副院长赵立三来与我见面，他说黄廉，我看你还有点理论素养，上诉是没有用的，你的案子不是重庆中院和省高院能够定的，我看你还是平静下来吧。然后就把我转移到大竹四川省第三监狱关押，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胡风，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在我到来之前，他们把监狱进行了一番整顿，把所谓的帮派骨干分子都转移走了，有的到南充，有的到重庆。那个时候刘张还关押在那里，刘结挺已经病得快不行了，张西挺的穿着就像是叫化婆，他们就与我隔墙。我想去劳动，监狱方说没有劳动的条件，也不会让你与犯人接触的，要我看报学习，交代我不要去高墙边，不要去接触武警。监狱政委来找我谈话，我告诉他不要用减刑来吸引我，你们愿意关押好久就关押好久，最多牢底坐穿，我只要求他在生活上不要搞阴谋，不要法外加刑，对我的枉法判决已经是变相的杀害，不要再搞法外执法，这就是我的希望，还要他们别把我的东西弄丢了。

（全文完）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